

俄罗斯

国防工业体转型及其
经济效应研究

THE RESEARCH
OF THE TRANSITION OF RUSSIAN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AND
ITS ECONOMIC EFFECTS

周维第 著

俄罗斯

国防工业体转型及其 经济效应研究

THE RESEARCH
OF THE TRANSITION OF RUSSIAN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AND
ITS ECONOMIC EFFECTS

周维第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及其经济效应研究 / 周维第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5
ISBN 978 - 7 - 5004 - 9790 - 5

I. ①俄… II. ①周… III. ①国防工业—经济体制
改革—研究—俄罗斯 IV. ①F45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8479 号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6.5 插 页 2

字 数 161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俄罗斯经济转型涉及方方面面，既涉及宏观领域的制度转型，也涉及微观层面的企业转型；既涉及俄罗斯经济转型的背景、目标和路径，也涉及具体的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经济机构的优化；既有宏观经济背景下的体制创新，又有微观经济层面的机制变更；既有企业转型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分析，又有企业层面的投资产出等绩效分析。目前，中国学术界在俄罗斯经济转型领域的研究不仅范围更加广泛，而且层次也在不断深化。不少学者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进一步深入探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中、俄经济转型绩效的影响，从文化的视角探讨中俄经济转型的绩效。此外，也有部分学者从中、俄经济转型的阶段性视角对中俄经济转型展开了更深入的研究。

作为转型经济大国，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绩效不仅对其自身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其他转型经济国家深化本国的经济转型也不无借鉴作用。近 70 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俄罗斯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导，国防工业体为主体的极为畸形的经济结构。由于俄罗斯 70% 左右的经济生活都与军事经济密切相关，俄罗斯的经济转型不仅表现为宏观层面经济体制的市场导向改革，而且表现为微观层面以军事工业为主

2 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及其经济效应研究

体的企业市场化改革。因此，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不仅是其宏观经济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表现为微观经济层次的企业转型；同时对整个经济的中观部分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自苏联时期开始，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走过了极其艰难的历程。从二战后的 20 世纪 40 年代后半期开始至今，俄罗斯国防工业体经历了多次的调整和变更。从国防工业体内各部门和体系的现状来看，变更和调整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实现两大目标：其一是在国内实现军民经济的一体化，以此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并推行经济创新；其二是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实现军事经济的国际化，借此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民产品竞争力的提高。因此，俄国防工业体转型实质上表现为国防工业体的管理体制创新、技术创新，从而推动以高度集中的军事经济为主导的畸形产业结构向市场导向下的产业结构转型，并通过国防工业体的转型推动企业自身经济效益的提高。前者主要集中表现在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向市场导向的管理体制转型，后者表现为国防工业体的经济运行向以市场价格为导向的模式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应特别注重科技创新在整个转型中的重要影响和作用。

本书的主要思路为：第一，对该领域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提炼，分析了目前对该领域现有文献研究的主要成就和尚存不足之处。第二，对苏联军工体的调整和变更进行了回顾，探讨了此前军工体在调整过程中存在的主要弊端及影响因素，并对其绩效进行了分析。第三，从经济理论的视角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进行了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理论模型分析，探讨了国防工业体转型的主要路径。第四，对俄罗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伴随“休克疗法”经济改革而展开的

国防工业体转型的现状、特征及主要绩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探讨。第五，对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的主要经济影响作了分析和梳理，针对学界在该领域分析尚显不足之处进行了相对较深入的补充分析和探讨；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对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背景下的俄罗斯经济创新及其前景进行了分析。最后，对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进行了总结。

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是其整个经济转型的重中之重，尽管转型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但转型不仅是俄罗斯经济向市场转型的客观发展之必要，也是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之所向。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不仅优化了其自身内部的结构，也对俄罗斯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作为俄罗斯基础和应用科学的重要阵地，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成为其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的分析探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转型经济国家具有很多有益的借鉴作用。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绪论	(1)
一 研究的视角及意义	(1)
(一) 研究的视角	(1)
(二) 研究的意义	(2)
二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述评	(4)
(一) 俄罗斯在军事工业领域的研究成果综述	(4)
(二) 中国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	(6)
(三) 总结及评价	(6)
三 相关概念阐释	(7)
(一) 军事工业体和国防工业体以及国防工业体 转型	(7)
(二) 国防工业体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	(11)
(三) 国防工业体转型与技术创新	(13)
四 主要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	(15)
(一) 研究思路	(15)
(二) 研究方法	(16)

第二章 苏联时期军事工业体调整的回顾	(17)
一 战后军工体斯大林模式的变更	
(1946—1950)	(17)
(一) 政府的主要政策措施	(18)
(二) 主要的绩效分析	(19)
二 赫鲁晓夫时期军事工业体的调整	
(1955—1965)	(21)
(一) 配合分权改革进行机构精简，提高国防	
工业体效率	(22)
(二) 裁减军队，减少军费支出	(22)
(三) 大力开展军事领域的科学的研究和试验	
设计工作	(22)
三 戈尔巴乔夫时期军事工业体的市场化	
转型试验 (1988—1991)	(23)
(一) 戈尔巴乔夫时期军转民的背景分析	(24)
(二) 戈尔巴乔夫时期管理缺位的军转民	(24)
第三章 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的理论分析	(31)
一 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的社会经济背景	(31)
(一) 冷战的结束	(31)
(二) 国际经济全球化的推动	(33)
(三) 俄罗斯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	(34)
(四) 国防工业体转型的社会和法律	
基础呈现“真空”	(35)
二 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的经济学理论探讨	(36)
(一) 国防工业体转型的宏观经济学分析	(36)
(二) 国防工业体转型的微观经济学探讨	(41)

(三) 管理体制转型	(50)
(四) 技术转型与技术创新	(53)
三 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路径选择	(54)
(一) 模型假设	(55)
(二) 模型分析	(56)
(三) 转型的最优路径选择	(57)

第四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的 实证分析	(59)
一 国防工业体转型内容及转型方案的制定	(59)
(一) 国防工业体转型企业的基本类型	(59)
(二) 国防工业体在俄罗斯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61)
(三) 国防工业体转型的内容和方案的制定	(62)
二 对国防工业体转型方案的财政支持 (1992—1997)	(67)
(一) 财政贷款方案的制定	(67)
(二) 财政贷款方案的具体实施状况	(68)
三 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的特点分析	(70)
(一) 前期无序的转型阶段 (1992—1994)	(71)
(二) 从无序逐渐走向有序发展的阶段 (1995—1997)	(72)
(三) 理性重组阶段 (1998—2000)	(74)
(四) 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的新战略 (2001年至今)	(75)
四 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的经济增长效用分析	(81)
(一) 俄罗斯经济改革政策及其国防工业体 转型	(81)

(二) 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的主要经济效用分析	(86)
五 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过程中尚存深层问题探讨	(97)
(一) 国防工业体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97)
(二) 进一步深化国防工业体转型	(99)
 第五章 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 (101)	
一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业结构状况	(101)
(一) 斯大林时期的经济发展	(101)
(二) 从赫鲁晓夫的分权改革到勃列日涅夫的重新集权	(104)
二 国防工业体转型对俄罗斯经济结构演变的影响	(110)
(一) 国防工业体内部结构演变	(111)
(二) 国防工业体转型对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经济结构的影响	(113)
 第六章 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及经济创新 (129)	
一 俄罗斯经济创新战略形成的背景	(130)
(一) 世界发展面临诸多危机	(130)
(二) 俄罗斯自身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132)
(三) 新世纪俄罗斯创新战略的确立	(133)
二 俄罗斯经济创新的发展路径	(135)
(一) 俄罗斯经济创新的现状	(136)
(二) 俄罗斯经济创新的路径选择	(145)

目 录 5

(三) 俄罗斯经济创新中尚存的主要问题	(149)
三 俄罗斯经济创新的发展方向	(151)
(一) 俄罗斯经济创新的优先发展方向	(151)
(二) 进一步推动生产技术的创新	(153)
(三) 促进服务领域的创新型发展	(154)
(四) 推动国防工业领域的整体创新	(154)
四 俄罗斯经济创新发展的远景分析	(154)
(一) 20世纪后半期俄罗斯技术水平的现状	(155)
(二) 2050年俄罗斯经济技术水平发展趋势 预测	(158)
结束语	(163)
附录 俄罗斯联邦面向2030年的创新发展战略	(169)
主要参考文献	(185)
后记	(195)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 研究背景

近年来，财政分权（fiscal decentralization）问题成为公共经济学研究领域和政府决策部门的重大课题之一，有关财政分权的理论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其中不乏对财政分权后果的研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更是研究的热点之一。不过，有关财政分权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财政分权的利弊之争持续不断，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要进行财政分权改革和怎样实行财政分权政策^①。但是，财政分权本身是多维的，它所造成的影响可能是多方面的，所以，为了判断一国的财政分权改革是否发挥了积极作用，就应该在实践过程中特别注意财政分权所带来的各种可能的后果，着重看财政分权的后果是否

^① Taillant (1994) 指出，许多国家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分权，而是“如何更好地”分权。

与该国的社会发展目标相一致。可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仅仅是经济增长吗？若不是，又该是什么呢？

目前，国际上最新的发展观已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追求人类发展（human development）^①，人类发展概念正逐步取代了等同于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人类发展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它并不仅仅追求GDP的增长，而是需要协调和平衡各种不同目标的目标集。经济增长并不是人类发展的最终目的，而只是实现这一目标集的手段。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财富显然不是我们所寻求的东西，因为它只有在寻求其他目标时才是有用的。”然而，把经济增长本身当做追求目标仍然继续支配着各国的政策选择，却不是关注经济增长怎么才能以可持续的、更公平的方式促进人类发展。显然，社会进步的衡量不仅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潜能的挖掘，还有赖于这种经济潜在能在多大程度上被用于实现社会中每个个体的和谐发展（UN-HDR, 2005）。实际上，2003年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从1991年到2001年，有21个国家经济增长了，但它们的人类发展指数却下降了。因此，把研究视野仅仅放在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上似乎并不全面，而应该从更广阔的视野来探讨财政分权对人类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财政分权为特征的财政体制改革对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已受到学者的普遍关注，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但是，理论界仍然侧重于探讨如何合理分权，对于财政分权后果的研究涉及不多。为数不多的研究文献也是集中于检验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的显著进步有一定的关系。理论上，改革的成果应该由全体中国人民共同享有，日益增长的收入和财富应该在国家内部公正、平等地分配，服务于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但是，在2005年9月8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① 有关人类发展的概念及衡量指标等将在后续章节中作比较详细的介绍。

在北京发布《2005 年人类发展报告》时却强调，中国在发展方面取得的显著进步并没有使贫困人口受益，中国社会发展已经落后于经济发展。报告还指出，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贵州省的人类发展指数刚刚超过纳米比亚，上海市的人类发展指数则与葡萄牙相当（孙汝祥，2005）^①。地区发展差距过大不仅会阻碍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与社会发展目标相违背，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有必要更新我们的发展观，正确看待经济增长，使之为中国人类发展服务，着重于人的生活质量和能力的提高，而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1995 年，中国政府也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之一^②，从以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追求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把经济增长作为追求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正是如何将其令人瞩目的收入增长转化为非收入方面的人类发展的可持续增长，中国的发展必须从追求 GDP 转到追求人类发展的目标。考察当前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研究现有的财政分权体制是否有效地促进中国人类发展水平，成为我们需要解答的问题。但是，关于财政分权后果的研究和人类发展概念的引入在中国还属于起步阶段。从国内外现有的文献资料看，探讨财政分权与人类发展关系的研究非常有限。

二 研究意义

本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一直以来，财政分权的利弊之争在理论研究和经验检验方面都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这在很

^① 孙汝祥：《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中国经济时报》2005 年 9 月 9 日。

^② 1987 年，世界环境委员会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1992 年，里约热内卢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把它正式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

大程度上是由于判断的标准不一致造成的。在这一背景下，有必要先明确社会发展的目的所在，作为“要不要”财政分权的检验标准，而后进一步明晰财政分权是如何实现这一发展目的的。因此，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和利用经验数据检验财政分权与中国人类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财政分权对促进人类发展有多大的贡献，又是通过怎样的途径来影响人类发展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可以拓展财政分权理论的研究范围，而且为财政分权的政策实践提供理论的支持和引导。

就我国财政分权的实践而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财税体制改革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50—1978年），是实行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模式；第二个阶段（1978—1994年），中央逐步放权。从1980年实行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到1985年实行的“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体制，中国财税体制开始进入分权的轨道；第三个阶段（1994年至今），以分税制改革为标志。如何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合理分权，始终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要点和难点。因此，本书的研究结果对检验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同时，探究我国财政分权是否与社会发展目标相一致，这对于完善财政体制，构建促进中国人类发展水平的政策体系，公平发展机会，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此，本书在系统总结相关的财政分权理论和人类发展理论，尤其是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就财政分权对公共支出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主要是通过财政分权作用于公共支出的理论模型的建立，以及中国财政分权对公共支出水平的影响的分析，而后从财政支出分权着手，结合中国财政分权的实践进行经验检验，分析了在财政支出分权背景下我国政府对促进人类发展水平所应起的作用，着重分析财政支出分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通过对这一关系的研究来探索平衡各地区间人类发展机会的机理，并相应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第二节 研究范围、方法和结构安排

一 研究范围

分权是一个广泛应用的术语，且在不同场合有不同涵义。国内外学者主要是从政治分权（political decentralization）、行政分权（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和财政分权（fiscal decentralization）三个不同的角度探究分权及其相关问题。政治分权意味着地方政府是由直选产生，地方官员要对选民负责。在行政分权下，地方政府有权聘用或解雇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而不涉及上级政府。通常意义上的财政分权则是指赋予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权，使其承担起在辖区内征税和支出责任。财政分权使得选举产生的地方官员必须认真衡量选区内的财政收入与支出，否则他就有可能在下一轮的选举中失利（Gurgur 和 Shah, 2002）。但是，本书的研究范围仅涵盖财政分权，不包括政治分权和行政分权。可是，财政分权理论本身所涉及的研究范围依然很广，正如 Grewal、Brennan 和 Mathews (1980) 所指出的那样，财政分权理论试图解决的问题很多，包括采取分权结构的原因、收入来源和支出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的配置原则、自由移民的效率性和政府间转移支付及其形式等。受研究目的的约束和文章篇幅的限制，本书主要讨论财政支出分权是否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相吻合。同时，虽然现在中国有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乡五级政府，分税制改革也确定了省以下分税制改革仿照中央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方案，但由于种种原因，省级以下的分税制改革仍不完善，不规范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且省以下财政分权状况的地区差别较大，所以，本书将把研究范围仅仅限定在研究中央政府

和省级政府之间的两级财政支出分权问题上。

目前，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理论和政策评估体系中，仍然是以 GDP（或 GNP）为核心指标，物的增长的发展观仍占据主流地位。但是，仅以 GDP 指标作为唯一的发展成就评估标准，并将其增长视为发展的最终目标时，会产生诸如资源耗竭、贫富分化、社会动荡等许多严重的问题，尤其表现在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上。1971 年，美国的丹尼斯·古雷特（Denis Goulet）率先提出“发展”的概念需要重新定义，他认为发展的意义应扩展到一个更广的层面上，那种以人类的痛苦和远期发展目标的丧失为代价的所谓的发展实际上是反发展的，它不符合人类发展的本质要求。发展理论和发展观的研究开始逐渐从以“物”为中心转向了以“人”为中心，并于 20 世纪 80 年代逐步形成人类发展理论。Amartya Sen（1985）认为应该以“可行能力视角”（capability approach）^①，即人们实际存在的实现一组功能性活动（functionings）的可能性或自由，作为评估个人福祉、社会安排和政策制定等的规范性框架。Anand 和 Sen（1996）接着进一步提出，应该从人类发展的角度看可持续发展，这一可持续发展观不仅考虑代际之间的人类发展不平等问题，也考虑代内的人类发展不平等问题^②。UNDP（1990）拓展和完善了 Sen 的发展观点，提出了人类发展理论，将发展定义为不断扩展人们选择的过程。之后，UNDP（2001）在原有定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人类发展的概念，“人类发展涉及创造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民众可以充分实现他们的潜力，并导向同他们的需要和利益相一致的建设性的和创造性的生活。人民是各国的真正财富。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民众所珍视的生活而扩大他们的选择，经济增长只是扩大人们的选

^① Sen 的“可行能力”思想在其 1985 年的《商品与可行能力》一书中基本形成，并在其后的研究中逐步成熟和完善。

^② Anand, S. and Sen, Amartya, K. Sustainable Human development: Concepts and Prioritie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1996.